

增订版

重启古典诗学

Poetica classica retractata

刘小枫 著

华夏出版社

013070245

B-53
24-2

重启古典诗学

Poetica classica retractata

刘小枫 著



B-53/24-2



北航

C1678511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启古典诗学/刘小枫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3. 9

(刘小枫集)

ISBN 978-7-5080-7487-0

I. ①重… II. ①刘… III. ①哲学—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6113 号

重启古典诗学

著 者 刘小枫

责任编辑 孙 颖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33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前 记

十年前，笔者转向古典学问时随即面临一个问题：中西方的古典学问博大精深，但在如今的学科建制中却找不到地盘，甚至找不到一个恰切的学科名称。古典学问不按如今的文、史、哲划分学科，如今西方的“古典学系”所授之学远未涵括西方的古典学问。如何为古典学问确立一个恰当的名称，使之在现代的大学体制中有一个落脚处，非常艰难——当时我想到的名称即“古典诗学”，但随之感到这个名称也需要大费周章地说明：它不是中文系的一个二级学科，更不是中文系二级学科古代文学下的一个专业方向，而是……

晚近十年，笔者试图从多方面说明何谓“古典诗学”，文章不论长短、不论文体，在此结集，便于学界同仁指教。

刘小枫

2009年7月识于

云南元江羊岔坳

目 录

- 1 前记
- 1 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
- 10 寓意叙事中的宗教争战
- 16 “诗学”与“国学”
- 53 “我们共和国的掌门人”
- 63 海德格尔与索福克勒斯
- 189 立言与读解：灵魂的品位
- 228 尼采的微言大义
- 288 市民悲剧博取谁的眼泪
- 307 重新绷紧琴弦的两端
- 316 司马迁属什么“家”
- 326 古典诗学书目三十种
- 340 天不丧斯文 [访谈录]

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

【题记】本文为笔者在《开放时代》杂志社与云南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合办的“古典西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2008年11月）上的发言，原刊《开放时代》2009年第一期。这里的文本综合了笔者在中国文化论坛基金会举办的“文教改革三十年”学术研讨会（2008年7月）上的部分发言内容。

前不久，教育部搞了一次例行大学评估，各大学纷纷抢在评估前搞装修——教育部的评估检查的是教学“质量”、设施（所谓硬件），没谁去检查我们的检查者的文教观念。

有必要检查我们当今的文教观念吗？当然有必要——就在“大学评估”展开的同时，已经有大学校长公开提出批评甚至表示抵制，体现出一个大学校长的本色。文教制度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品质的优劣，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必须保养每个时代都会有的少数优秀少年、青年，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如今叫“承重墙”。文教观念不对，承重墙建设就会出问题，甚至使我们的国家不再有承重墙。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变革成就举世瞩目——然而，闭门自省，我们自己心里清楚，三十年改革取得的并非都是成绩，也有败绩——文教改革就是其一。

文教改革三十年应该区分前十五年和后十五年，两个十五年品质差异极大，所谓“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差异：前十五年怪现象不多，后十五年不仅怪现象铺天盖地，而且败象丛生——严格来讲，文教改革三十年，主要是后十五年的变革，而且明显越改越糟。有目共睹的是所谓教育产业化——我们的理由可能是：当时国家太穷，无力支撑大学的发展——可是，民国时期同样很穷，但在这一我国现代文教制度的初建期，虽然全盘西化已经铺开，大学的实用化和职业技术化程度却远不如现在——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本科生比得上如今的博士生？中国学问的自信心为什么比如今还踏实？对比我们的“文教改革三十年”，退步还是进步？如果退步，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没有留学的蒙文通、熊十力的学术生命力，比留洋博士冯友兰更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我们不断听到设“国学”为一级学科的呼声。有人说，这种呼吁与我国的“和平崛起”同步。其实，即便不考虑“和平崛起”的政治异象，升科设教从来就是文明国家文教制度的基要问题。我国大学的文科一级学科建制早已屡遭诟病，如今的确到了必须通盘重新考虑大学文科建制的时候。

“国学”这个名称古已有之，但古今有别——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提法出现于清末，兴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与这一名称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还有“汉学”（同文馆中设“汉

学馆”)、“中学”等，明显意在与“西学”对举，保守我国文教制度不致因西学入华而支离破碎，应对中国政制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凡此提法无不是迫于突然而至的中西之争来考虑中国文教传统的危机问题。我们都知道，所谓“国学”或“中学”指中国传统学术的总和，但与此相对的“西学”概念，却并非西方传统学术的总和——我们所谓的“西学”实际指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并不包括西方的古典学术。这里隐含着—个重大问题：西方学术就总体而言包含着古今分离或古今之争，就“国学”指中国学术不绝若线的传统而言，“国学”与“西学”对举，恰恰表明我们欠缺对西方学术中所包含的古今离异或古今之争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一盲目意识下展开对传统中国学术的讨伐。

不妨举两个例子。章太炎先后撰《国故论衡》(1910)和讲授《国学概论》，“国学”被等同于“国故”，意味着整个中国传统学术成了“国故”，与此相对应的“西学”仅仅是西方“现代”的学术，而现代同时意味着“进步”。在这一学术观念格局中，“国学”的正当性本身就需要不断申辩。

另一个例子是：众所周知，我们的大学要么是西方传教士兴办的，要么是国人学着西方人兴办的，大学的主体无不是理工农医诸科乃至政法、经济、社会学、政治学等实用学科，就此而言，中国的大学就是西方现代大学的移植，我国古代(晚清以前)从来没有过什么“大学”。我们的大学发展到今天，晚清洋务派的理想才最终实现——科学院院士或工程院院

士成了大学校长的当然资格。那么，中国学术传统的传承在哪里？文明传统以语文及其经典作品为基础，我国的中学生一律要学语文（中文）课，但中学语文讲授的我国历代经典作品仍然非常有限，现代语文占据了相当份额——升大学后，学生分赴各理工农医诸科乃至政法、经济、社会学、政治学等实用学科，不再会有机会、也不再会有义务习读历代经典作品。

文教是大学的核心要件，但在如今的大学中，文教所占的份额实际相当小，就此而言，文教显而易见已经不再是现代大学教育的主体，甚至连基础也不是。文教以古典语文为基础，古典语文不是当下正在说的“言语”，而是历史上已经成文的经典。在我国的大学中，中国语文学系（中文系）的规模远不如西方语文学系（英语系）——如果再加上俄、法、德、日、西、意语系，任何一个大学的外语学院的规模都远远超过中文学院，但这些西方国家的语文至多不过五六百年上下的历史，而且我们的外语系偏重的并非文学性的语文，而是实用性的语言，从而是实用性学科，不然就不会出现哪个国家强势或有生意可做，就开设哪个语种的现象。

现代大学的建设首先考虑的是实用、实利，显而易见的结果是：我们的大学开科设教的视界最终受现代国族竞争实际利益的牵制——鉴于晚清以来我国屡遭外国列强欺诈掠夺，办大学必须从国家的经济、军事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因此，开设种种实用技术学科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传统文教是否也要变成实用、实利学科，也要接受技术科学原则的指导——事实上，晚近二十年来，我们已经建立起完备的技术科学指导人文学科的原则和制度。

因此我们必须问：“国学”在哪里？西方的古典学术在哪里？

如今“国学”散见于文、史、哲三系，由于划分文史哲本来就是现代西方学术的产物，“国学”散见于文、史、哲三系无异于被现代西方学术观念切割得七零八落（中文系八个二级学科中仅“中国古代文学”和“文献学”涉及古典文教，哲学系八个二级学科中仅“中国哲学”专门涉及中国古典文明）。加之，如今文、史、哲三系无不以现代“西学”为体，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的研究和教学，无不以西方现代的各种时髦理论为导向和基础——“国学”在历史系所占份额最大，但历史学接受西方现代理论的洗礼恰恰最彻底（晚近十年几乎全盘人类学化就是证明）——即便想要保护中国伦理传统的当代儒学，也几乎无不依傍西方的种种现代论说。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之一，乃是我们对西方的古典学问非常陌生，没有建立起古典的视野，从而不清楚西方现代科学的底线。

晚清以降，中国文教制度面临的基本处境即是“西学”入华后道术分崩离析的局面，新中国如何与传统中国保持血脉关系，一直是中国现代学人没法避开的问题——洋务运动时期，卫道士们拒绝实用技术科学，其结果是国家被列强切割；如今，以实用技术科学统领文教，其结果是自我了断自家文明传统。由于我们高等教育的学科建制中迄今没有专门研究（传承）我国传统文明的一级学科，晚清学人第一次真正面对西方文明时的关切和抱负迄今没有立足之地。如果不透过中西之争看到古今之争，进而把古今之争视为现代文教制度问题的

关键，“中学为体”最终只是一句空话，变成实际上的“西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现代“西学”本身问题多多，我们与国际接轨必然是接种病菌，这恰是我们当今文教制度改革走向末路的根本原因。

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大量实用技术人才，高等教育的实用取向无可非议，但如果以教育品质的败坏为代价，那么，这一代价就高得无以复加了。一个国家的招牌大学也以培养各行各业的高级白领为最高荣誉，国家的品质如何便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晚近十多年来，我们亲眼目睹大学文科的实用取向有增无减。

为了葆有教育的教养品质，高等教育的实用取向必须得到平衡——倘若如此，似乎唯有采取两种方式：要么把实用技术学科从大学中切割出来，根据国家需要或按市场需要多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不按市场需要而是按国家计划少办精办博雅性质的大学；要么在大学中建立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让所有专业的大学生都接受两年素质教育。施行前一种方式的机会恐怕早已一去不复返，施行后一种方式的机会则迫在眉睫。然而，葆养大学的教养品质必须依靠文科，否则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难以推行（大量师资就无源无本），但如今的文科即便脱去实用取向，也依然是现代品质的，因为，如今大学文科的基础并非古典文明，而是现代化的漩涡。

倘若要平衡现代化大学不可避免的实用技术取向必须凭靠设立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那么，我们首先需要改革的是大学文科：既然现有文科各一级学科无不是现代取向的，则唯有在大学中为古典学术划出独立地盘才可望达成古—今平

衡——我们无可全盘否弃实用技术学科，而是以教养教育来与之达成平衡，以葆教育品质不致败坏。同样，我们无需全盘否弃文科的现代取向，而是以古典教育来与之达成平衡，以葆文科品质不致败坏。尼采在十九世纪末已经看到，如果要遏制现代大学教育品质的败坏，必须好好经营古典学。古典学在现代文教制度中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起到“不合时宜的伟大作用”，即以“抵制现时代”的方式“作用于现时代”，从而有益于未来的时代（参见《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篇，前言）。

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文教面临重新命名的问题，如今，中国传统文教面临再次重新命名的问题：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古典学，以取代“五四”以来流行的“国学”。“国学”这个名称其实很难对外沟通：日本、韩国高校都有扎实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学人族，日本称“支那学”，韩国称“中国学”，西方则称“汉学”——如果以“古典学”来命名中国的传统学术，不仅可避免名称上沟通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由此我们得以从中西之争回到古今之争。在我国少数高等院校建设一级学科的古典学，不说是当务之急，至少也是被耽误了近百年的拖欠“工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所说的西方文明，实际指的是现代西方文化——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后冒出来的若干强势国家所代表的“技术文明”，但这些现代国家的经典作家无不受古希腊—罗马文明经典的滋养。迄今为止，这些国家的招牌大学中的古典学系仍然实际起着共同的文明纽带作用。不仅如此，当今的强势西方民族国家有意无意高标自己才是西方文明大传统的担纲者，国家在政治上的强势与该国大学中古典学的强势往往同步（请看十九世纪的英国、德国和如今

美国的例子)。西方的古典学教育从人文中学开始——西方名牌高中以开设古典学课程为指标（必须有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课程），我国名牌高中以升学率而非以偏重中国古典语文课程为指标，相比之下，谈何文明传承。

如此说来，我们应该再次学习西方、模仿西方大学中的古典学系来建立我们的古典学？决非如此！

尼采主张绷紧古今之间张力，通过展开古典教育使现代文教制度中的现代因素得到平衡，因为，“与人类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相比，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相当不道德的时代：习俗的势力已惊人衰落，道德感又变得如此精细和高高在上，以至于它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随风消逝”（《朝霞》，第9条）。可是，西方学界百年来尖起耳朵听的是尼采关于“超人”的说辞，而非关于古典教育的教诲。事实上，在西方高等教育界，作为西方古典学术的古希腊—罗马文教传统大多龟缩在古典学系，不仅变成“故纸”研究，而且在经过现代学术的人类学和语言学“洗礼”后，按尼采的说法已经变得“忘祖忘宗”——“我们的古典教师是如此狂妄无知，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古代，并把这种狂妄无知传给自己的学生，同时还传给他们一种轻蔑，让他们觉得，这样一种了解对人类的幸福毫无帮助，只对那些可怜的、痴呆的、不可救药的老书虫很有用”（《朝霞》，第195条）。的确，如今最有活力的西方古典学在美国，然而，美国的古典学活力恰恰不在古典学系，而在打破文史哲学科划分、以传授历代经典为学业的本科建制的博雅学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和通识教育制度，这意味着，古典学必须走出现代学术为其划定的狭窄地域，成

为现代大学文科的基础性学科，从而使古典教育获得现实活力——办古典学本科，主要不是为古典学硕士、博士提供人才，而是为大学中现代取向的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提供优秀人才。

因此，如果建设中国的“古典学”（Classical Studies）走与西方主流大学的古典学专业接轨的路，我们会走上一条错路。我们应该立足中国古典文明传统，自立以传授中西方古典文明为学业的本科建制。就我们的教育体制而言，就是要建立作为一级学科的古典文明学系（简称“古典学系”），因为，如尼采所说，古典学的使命就是葆养古典文明。在这一学科建制中，中国古典文明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犹太—基督教文明和印度文明同为二级学科，尽管可以有所侧重。

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合璧的古典学，方可望以此开科设教来完成晚清以来中国学界的有识之士想做而一直没有做成的教育大业——营构坚实的高等教育的文明基础，使得我国的担纲性人才培养不致荒废：立足本土培养“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皮锡瑞语）的新时代栋梁之才。如今，中国的“崛起”使得我们面临的仅仅是又一次拮据：外汇储备增加不等于文明恢复元气，过去三十年的成功不担保未来三十年一定成功。每个时代都不会缺少才俊，但从来不会遍地是才俊。如何使得为数不多的“江山才俊”不至于都成了高级白领，而是成为“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的文明担纲者，乃是建设中国的古典文明学系的根本意义所在。

寓意叙事中的宗教争战

读完谷裕博士的《隐匿的神学：启蒙前后的德语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我才真切体会到，自己从前在学习德语文学的途中走过多长弯路。

三十年前（1978年）报考大学时，我填报的专业志愿是“法国语言文学”——当时想，既然有可能读大学，就得好好珍惜机会，学习不太有条件自学的小语种。但德语也是小语种，为什么没报德语专业？

那个时候，当听说可以考大学，简直做梦都不敢相信——如今我们把“文革”结束的时间标志定在1976年，其实，至少在77年底突然得知恢复高考之前，我自己的感觉仍然是“文革”式的。这年秋天，我从下乡插队的川东深山回到城里，在重庆市立图书馆当职员，每天的工作是给进馆的每本新书端端正正盖上馆藏章。以前听人说，在图书馆工作可以读书，这时才知道，完全是瞎说——每天得给上百本书盖章，完全是计量劳动，哪有时间看书……直到78年春天，这个市立图书馆的图书搬运工仍然是两位所谓“历史反革命”——较

年轻的一位留学过苏联，年长的一位已经六十出头，早年留学法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尽管我非常崇拜他，想跟他学法文，却不能拜这位王姓老先生为师，否则就成了与……勾结。

话说回来，76年确实是个历史“时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一帮同龄朋友开始狂热地读西方古典小说。我读过的小说中，法国小说家给我的印象最深：雨果、梅里美、司汤达、乔治桑、莫泊桑（李青崖译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德语文学家仅读过歌德和海涅，都喜欢不上，于是以为德国只有哲学，没什么文学家，尤其小说不行。由于想学写小说，我想当然地以为，应该学法文，因此填报了法语专业。

恢复高考的喜讯突然降临，几乎没怎么好好准备，就匆匆上了考场，结果成绩平平，虽上了录取线，但外语学院的法语专业被成绩考得好的考生占满了——当年应届毕业的高中生投入高考，当然比咱们下乡知青有优势。幸运的是，德语专业没招满，我被调配到德语专业。

在外语学院读书，我——不仅我——还有我们一帮同学都非常仰慕在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系读书的同行，比如北京大学的德语专业、南京大学的德语专业、武汉大学的德语专业等等，因为，大学里的外语系以修“语言文学”为业，我们的专业则仅仅修“语言”，自觉低人家一大截。毕竟，据说人家除了学语言，还要（甚至主要）学文学——读原文的小说、诗歌、戏剧，多幸福！我们这些专业外语学院的，不过仅仅学会说外国话，学得再好至多不过嘴皮子快，对了悟人生和善于言辞都不会有任何长进。

文学作品才养人，大学不是技术学校，如果仅仅为了学说

外国话，两年时间也就够了——三四年级学什么呢？外报阅读、科技德语、商务会话……这些还需要花时间在大学里学？想想看，倘若你在中文系学的不过是晚报阅读、科技汉语、商务会话……那成了什么鬼大学生？

尽管是专业外语学院，七十年代的我们——不仅我们这些学生，还有我们的老师都热爱文学，没有德语文学教材，我们的老师自己选编德语文学读本，全是古典文学……于是，我才知道，德国除了歌德和海涅，还有莱辛、诺瓦利斯、克莱斯特……于是，我才知道，过去我以为德语文学家除了歌德和海涅没别人，不过是因为，相对从事法语、英语、俄语古典文学翻译的前辈来说，我国从事德语古典文学翻译的前辈要少得多——于是，我切身感到，前辈的翻译对我们年青一代的学习兴趣取向的影响真不可小视。

刚上三年级时，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三位先生主编的四卷八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第一卷面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初版五万册；第二卷，1981，初版四万册），如今的大学生没法感受甚至理解当时我们这些在校生生所感受到的震撼——要知道，对于还没有彻底脱离“文革”感觉的我们来说，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是绝对腐败，甚至反动的东西。那个时候，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甚至会惹上没必要的麻烦——《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三卷出版时（1984），已经改为“内部发行”，印数限制在两万。

禁忌的东西反而容易对我们这些年轻人产生很大吸引力——那个时候，正因为现代派作品是禁忌，我们便不假思索地热爱这些东西……就这样，本来我们的德语文学界正准备好